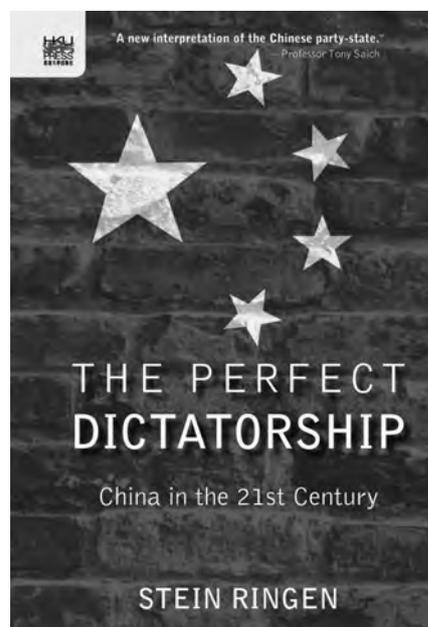


孤掌難鳴

——評 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 黃偉豪

孤掌難鳴，人民和政府往往存在一種共生關係，互相配合，也互相影響。完美的獨裁政府能夠成功，是因為有完美的順民願意配合。這正是林根《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一書論述的重點。



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一 獨裁者與順民的完美配合

孤掌難鳴，人民和政府往往存在一種共生關係，互相配合，也互相影響。這說明了權力的雙向性：

權力必須透過人民和政府的互動和承諾，最少也需要默許，才能建立合法性 (legitimacy)，得以穩定而有效地運作。完美的獨裁政府能夠成功，是因為有完美的順民願意配合。這正是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林根 (Stein Ringen) 所著的《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以下簡稱《完美的獨裁》，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論述的重點之一。

本文希望以上述看法作為切入點，討論書中的內容如何幫助我們更了解當前中國的管治，以及它對香港的啟示。中國的獨裁制度雖然看來完美，對追求民主和開放的中國的人們來說看似絕望，但其實仍有希望。這與「半杯水滿，半杯水空」的道理相似：既然人民的主動服從和甘心配合，是完美獨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即表示人民仍然可以透過一起拒絕，共同向當權者說「不」，從而改變這個制度。

《完美的獨裁》這本不足二百頁的小書最醒目的地方，並非印上中國五星紅旗的紅色封面，而是其

中心思想和主要論點。本書正面回應了時代對中國的想像，抗衡和試圖粉碎有關「中國模式」的美好論述。充滿着追尋真相的使命感的作者透過本書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揭開中國完美獨裁制度的真面目，以及探討這一切是如何煉成的。一石激起千重浪，本書最能引起關注的觀點之一，正是人民對完美獨裁的誕生和有效運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有着不能推卸的責任。

本書引起熱烈討論，除了與其內容及論點有關之外，它在一個適當的時刻面世也是原因之一。本書的副標題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即其焦點所在是當前的中國與它的管治模式和發展方向，而非過去的歷史。自習近平在2013年出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不少人都想知道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是任何關心中國發展的人士，包括已回歸中國、成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的市民，所要面對並非非常希望解答的問題。而在書中，作者嘗試透過不同章節，給予讀者一個中國最新情況的檢視和分析。由於這是一本篇幅較短的小書，作者在介紹和分析中國方面不可能長篇大論，而是希望恰到好處地把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層面之上：中國的制度在現實與表面的分別，以及習近平時代與過去的時代有甚麼差別。

因此，本書的貢獻和優點，並非在於它的歷史回顧和資料整理，而是它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最新發展之分析和預測。本書在上述兩個層面的分析，其突破性見解使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的看法是：中國的制度的現實與中國官方論述

和外界對它的理解，存在天淵之別；而習近平時代與過去的管治模式，也有十分明顯的不同。

簡單來說，對於前者，作者的結論是中國存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完美的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制度，利用很多黑暗和恐怖的手法來達致其管治目標，而並非如外界所見(包括學術界中的某些看法)，只是用較為不民主和權力集中的溫和專制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來進行管治。對於後者，作者的結論同樣使人憂慮，因為這個完美的獨裁制度，正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的寫照：使權力更為集中、推廣「習核心」等概念、鼓吹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推動個人崇拜等手法，均與習近平之前、重視集體領導和經濟發展等務實政策的中國管治模式，存在重大差別。習近平上台前後的一切轉變，均使「完美的獨裁」更為完美，也更為獨裁。這是一種危險，在政治制度發展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倒退。

二 悲觀與樂觀之爭

在當代中國的研究上，特別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領導經濟改革開放以後，基本可以分成兩大陣營，各有不同的論述。顯然，一派對中國的發展較為樂觀，充滿希望和讚賞；而另一派則對中國的前景較為悲觀，抱有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一般來說，較為樂觀的一派比較着重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確實在經濟發展上取得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驕人成果，不僅成為了「世界工

林根把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層面之上：中國的制度在現實與表面的分別，以及習近平時代與過去的時代有甚麼差別。作者的結論是中國存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完美的獨裁」制度，而這正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的寫照。

「中國模式」的興起，既打破和顛覆了現代化理論下經濟發展帶來政治發展的先後次序的預期，也扭轉和突破了簡單的二分法，即不再認同發展是經濟成果與非經濟成果的二選其一，而是有一個兩者兼得的模式。

廠」，還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對來說，較悲觀的一派自然把焦點放在經濟以外的範疇，特別是中國人權及民主的發展之上。

曾幾何時，樂觀和悲觀兩種看法被視為只是發展的先後次序問題，兩者有着接軌的可能。正如民主化研究中的現代化理論指出，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將會對傳統的專制獨裁政府帶來壓力。面對這種情況，只有開放政治制度走向民主化，才能維持有效的管治。這是民主化理論大師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他的經典著作《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所提出的重要論點^①。1980年代初期，英國決定在1997年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也是以中國的經濟最終會推動政治發展來安慰香港人。可是，這個經濟發展會促使國家民主化的預言並未在中國實現，1989年更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直至今時今日，中國仍未進行任何具實質意義的民主和政治改革。

本來，悲觀與樂觀兩派之爭，似乎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如前所述，樂觀一派較着重中國在經濟方面的發展與成就，而悲觀一派卻聚焦於中國在經濟以外的發展，除了人權與民主等政治問題以外，也包含其他方面的發展和負面影響，例如財富分配、貧窮問題、環境的破壞。以上種種因為發展經濟而付出的代價，在經濟學上稱為發生在市場之外的界外效應 (externality)，為中國帶來龐大的社會成本。可是，所謂「中國模式」的興起，既打

破和顛覆了現代化理論下經濟發展帶來政治發展的先後次序的預期，也扭轉和突破了以上簡單的二分法，即不再認同發展是經濟成果與非經濟成果的二選其一，而是有一個兩者兼得的模式。換句話說，中國的管治及發展模式，首次被認為不只是在發展經濟上佔優，在政治和社會上也是可取的，能夠和其他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模式匹敵。

「中國模式」，是相對於「美國模式」或「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而言的概念，「中國模式」的支持者認為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皆比着重自由市場和民主的「美國模式」優勝。而「中國模式」的支持者已不再局限於一般市民和決策者，更包括了學者，一個突出例子是現時在中國任教的加拿大學者貝淡寧 (Daniel A. Bell)。他著有《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一書，提出中國集權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比民主制度更優勝，更能夠用人唯才 (meritocracy)，而不帶來民粹主義和利益團體政治，彌補了不少民主制度的缺陷和漏洞^②。

對於愈來愈多人 (包括學術界) 支持「中國模式」，這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現象或客觀分析的結果。在「不要和成功爭論」(do not argue with success) 的定律下，正如鄧小平所說：「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捉到老鼠的便是好貓」，結果和成就往往決定了人們的立場和價值。美國的國力衰退以及中國的國力增強，是導致人們看法發生轉向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當中一個重

要的分水嶺是使美國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2008年金融海嘯，而2017年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成為美國總統，以及背後所反映的民粹主義和民意兩極化，也進一步加強了外界對民主制度的懷疑，削弱人們對西方制度的支持。

三 「管控專制」下的自我監控

「中國模式」崛起時，也是民主制度處於低潮的時候。在近年各式各樣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下，加上恐怖襲擊、貧富不均、種族與難民問題等種種因素，歐美不少民主國家皆面對內憂外患，不再如童話故事般令人憧憬，而以民主制度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亦難以使所有人信服。這時候，《完美的獨裁》一書的出版，就像平地一聲雷，使相關制度的討論和探索可以更為平衡。現實往往不會傾向任何極端，每個制度均有一些優勢，但也有鮮為人知的黑暗面。因此，即使你不認同《完美的獨裁》一書中的論點，但無可否認，它成功地拓闊了讀者的思考空間，能夠抗衡有關「中國模式」的一面倒的論述。

在林根眼中，「中國模式」是一個外表風光，內裏黑暗，表裏不一的制度，絕非一個完美的另類選擇。簡單來說，林根理解和見到的「中國模式」，與官方一般論述不同，甚至剛剛相反。例如，他認為中國的真實制度並非如貝淡寧在《中國模式》一書中所指，是由一批透過用人唯才、非選舉的制度所產

生的精英，大公無私地為人民服務。林根指出這只是假象，是中國政府用排山倒海的宣傳所製造的面具和外衣。在骨子裏，中國目前的制度是為保障當權者而設的，在思想、價值和行為上追求絕對控制，基本上不容許公共領域或私人空間存在，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完美獨裁制度。

由於中國獨裁制度的獨特性以及對人民實施空前的監控，林根認為根本沒有任何現成的概念和字眼可以適當地反映中國的真實制度，因而需要自行創立一個全新的概念。林根認為單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獨裁」(dictatorship)等字眼來形容當今的中國，雖然尚算正確，但卻過於粗糙和籠統，未能精確地捕捉和描述中國政治制度的神髓；也指出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體制太過溫和。所以，面對中國的特殊情況，他創造了「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一詞(頁138、143)。

作為一個「管控專制」的國家，中國成功的地方並非只在於它甚麼也能控制，一切都要在政府的掌控或默許下進行，而是在於要達到「管控專制」的手段，並不只靠暴力和高壓，還要令人民自覺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成功地把外在和強制的監控提升至更高的層次和境界，成為一種內化的自我監控：人民不需被命令不要去做某些事情，便會自動自覺地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這令人產生中國「沒有那麼獨裁」的錯覺——起碼在人民心中，便有這種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的感覺。

林根認為單用「極權主義」或「獨裁」等字眼來形容當今的中國，雖然尚算正確，但卻過於粗糙和籠統；用「專制」等字眼去形容中國體制太過溫和。所以，他創造了「管控專制」一詞。

因此，林根稱中國為「完美的獨裁」的典範，也以此作為書名。這個獨裁「完美」的地方，正在於它有「完美順民」，自願地去接受和配合它的管治，不需要長期透過武力鎮壓來支撐其政權及維持政局穩定；在大大減省管治成本之餘，也有助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它的長期管治能力。

本書的啟發之處，除了在於揭開中國政府能長期維持它的獨裁管治之謎外，還清晰地指出了權力的雙向性，這一點正正設合法國哲學大師福柯 (Michel Foucault) 對權力的分析：權力不但無處不在，而且涉及一個有權者與無權者雙方接受的界定過程^③。同樣地，在中國，監控無處不在，涉及政治及其以外的所有層面，並被人民廣泛和自願地接受，習以為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如福柯所言，一個權力關係能夠長期維持並有效運作，不可能單靠有權者從上而下的施壓，也要依賴授權者的默許和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的存在。他們放棄掙扎和反抗，甚至變本加厲地主動配合，使制度的運作變得流暢和完美，情況就如林根所描繪的中國一樣。

四 中國轉弱的警號

根據本書的分析，中國之所以出現「完美的獨裁」或「管控專制」，除了有賴於監控科技的日新月異，特別是監控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外，也是為勢所迫。近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下滑，導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得不在管治模式上轉型，以維持它的獨裁制度。

在分析中國的政治制度時，林根曾引用著名德國政治思想家阿倫特 (Hannah Adrent) 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一書^④。在書中，她指出了「獨裁」與「極權」的分別：極權政府固然是獨裁，但比獨裁政府更甚的是，極權政府不容許私人空間的存在。亦即是說，極權政府的權力觸鬚延伸至人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任何一個細節；只要極權政府喜歡或覺得有需要，一切的事物也可以監管、過問，甚至封殺。在這一制度下，人民基本上沒有任何真正屬於自己的權利，一切的權力也歸於政府，並且不需要面對任何制約 (頁 139)。

在進一步的闡述下，阿倫特歸納了極權政府的四個特色：第一，極權管治要靠恐怖的手段作為後盾；第二，極權管治滲透至任何私人領域，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和交往層面，包括家庭事務甚至是思考模式；第三，極權政府的管治必須依靠一個龐大和非人化的官僚系統來執行；第四，極權政府必須依靠一套意識形態，來合理化和支撐其管治。有趣之處是，她並不認為中國符合以上全部四個標準，可以成為一個極權國家。理由很簡單：因為中國面積太大，內部的不同地區也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可是正如林根在書中所說，在今天，現實的中國必定給予阿倫特一個莫大的「驚喜」，因為它成功地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地符合她所提出的四個條件的極權國家，而且是一個完美的典範 (頁 139-43)。

在林根的眼中，中國的政權很明顯是要依靠恐怖的手段來維持管

中國獨裁「完美」的地方，正在於它有「完美順民」，自願地去接受和配合它的管治，不需要長期透過武力鎮壓來支撐其政權及維持政局穩定；在大大減省管治成本之餘，也有助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它的長期管治能力。

治，例如每年均有不少只是根據憲法來爭取自己應有權益的維權人士被關進監牢去。至於中國政府有權干預人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電視及電影的內容，以及人民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談話內容，事實也是明顯不過（頁105-109）。單純地以言入罪，在中國已非甚麼新鮮的事情，而最近在北京出現的任意強行移除「低端人口」的政策，也是典型的極權政府擁有無上和不容挑戰的權威的縮影。用意識形態主導管治的做法，在習近平時代更趨明顯；監控言論的最終目的之一，是為了統一思想。真正使阿倫特對中國的判斷和預言出錯的原因，在於第三個條件。在她的年代，未能看到互聯網等尖端資訊科技的出現，想像不到中國如何在科技的進步下成功建立一個有能力監控全國的龐大官僚架構，使「維穩」成為了國家的重大產業（頁143-44）。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林根的分析，中國走向「完美的獨裁」之路，所反映的並非中國愈來愈強大，相反地和尷尬地，這其實是中國由強轉弱、由盛轉衰，迫不得已採取的應變措施。林根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大不如前，雖然每年仍錄得增長，但增速早已放慢，由以往有過的兩位數字增長下滑至近年只有單位數字的增幅（頁136）。在經濟形勢轉差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再難沿用自鄧小平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的策略，透過分享經濟成果來爭取和收買民心。與此同時，由於不需要全力催谷經濟，中國政府也沒有必要再堅持「實用主義」的政策。

在經濟放緩下，經濟奇迹不再——不只是經濟每隔幾年便翻

一番的好景不再，還因為地方債務和樓市泡沫等種種問題的困擾，中國經濟存在不少潛在危機和風險。在如此形勢下，中國政府決定改變其管治策略，用意識形態取代經濟成就，作為管治的手段和工具。在這個大轉向下，近年中國政府不斷強調「政治正確」的思維，鼓吹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民族主義及愛國精神等。林根警告說，這個依靠意識形態來管治的新模式，無論是對中國自己，還是對世界，特別是周邊的鄰國來說也是相當危險的。因為當理性的決策換上了不理智和瘋狂的意識形態，和平的國際秩序碰上了仇外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時候，隨時會帶來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以及更多的軍事衝突（頁169-72）。

五 擁有說「不」的選項

在「完美的獨裁」下的中國現況，是灰暗和唏噓的，但這不代表前路一定是個完全看不見轉變的可能的困局。轉變的希望，正源於分析的理論本身：既然完美的獨裁政府本身需要順民的完美配合，孤掌難鳴，只要人民願意說「不」，明白自己擁有說「不」的選項，就是邁向轉變的第一步。在這一點上，雖然林根引用了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但卻忽略了她另一本更震撼、與他對完美獨裁政府的分析更加息息相關的著作，這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⑤。

中國走向「完美的獨裁」之路，所反映的並非中國愈來愈強大，相反，這是中國由強轉弱、由盛轉衰，迫不得已採取的應變措施。中國經濟奇迹不再，政府決定改變其管治策略，用意識形態取代經濟成就，作為管治的手段和工具。

既然完美的獨裁政府本身需要順民的完美配合，只要人民願意說「不」，明白自己擁有說「不」的選項，就是邁向轉變的第一步。只要小人物不忽視日常生活中可以產生的巨大作用，選擇「抗命」，便是在「完美的獨裁」制度下打破缺口的一個關鍵。

該書是阿倫特在研究和追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主要戰犯——負責執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邪惡殺人命令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訊後，得到重大啟發而寫成的著作。她在書中的重要發現是，和很多人的一般想法完全相反，極端邪惡的行為並非由狂熱或心態不正常的人所犯，而往往是由心理完全正常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人所作，這正是「平庸的邪惡」的含意。用她的說法，就是因為每個人都只是視自己為平凡人和小人物，一方面忽視自己的力量，逃避自己的責任，不去思考自己行為的後果、意義和影響，用「盡忠職守」和「執行命令」作為逃避的藉口和擋箭牌；另一方面輕視生活和工作上的簡單行為的重要性。結果，平庸的人成了獨裁政府的同謀，而生活中的每一個行為，在日積月累下也可能影響深遠。平庸的人，就是這樣犯下彌天大罪。

即使有着站在幕前、永遠看似在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歷史大事往往也是透過無數日常生活中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自動配合才得以完成。只要這些小人物不去「認命」，不忽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產生的巨大作用，而選擇「抗命」，便是在「完美的獨裁」制度下打破缺口的一個關鍵。當然，這裏所指的「抗命」，並非是在武力上和獨裁政府抗衡，這只是以卵擊石。在獨裁政府的權力滲透到人民生活中每一個環節的時候，有效抗衡的方式是在不同的環節捍衛自己的自由，使屬於獨裁政府的空間和領域逐步縮小，屬於市民和公民社會的公共空間和領域日益擴大。

想知道如何能夠抗衡「完美的獨裁」，把「平庸的邪惡」轉化成積極的善良，看完《完美的獨裁》後，必定要看由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著的《論暴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⑥。斯奈德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振奮人心，提出二十個方式來為平庸的人充權，清楚地說明每個人可以在生活上如何轉變，以克服暴政或防止它的出現。在二十個抗衡極權暴政的方式當中排行首位、亦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不要預先服從」(do not obey in advance)，這是針對「完美順民」太聽話的死穴。它使人民明白在很多生活的環節和細節上，仍然存有說「不」的選項，不需要事事預先服從，無時無刻也在自我監控、自我審查，最終跌入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的邪惡」的相同陷阱，受害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名副其實的自作自受。

六 由中國到香港， 從生活到善治

由於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而「一國兩制」對香港的保障，亦在多次的人大釋法和中央不斷介入香港事務的情況下受到削弱，筆者認為《完美的獨裁》所提出的問題與香港有密切關係；同樣地，在《論暴政》中提及的應變方式，也可以套用在香港之上。香港和中國的不同之處，是中國需要削弱獨裁的完美度，而香港則要防止獨裁的降臨。

在香港，當新一屆特區政府不願意作政治改革，由上而下的改革遙遙無期之時，正是時候思考由下而上的改革方向，以期建立更多的公共領域和自由空間。在這個方向上，只有把改革結合政策與日常生活，才能得到市民最大的支持和共鳴，使運動有靈魂、活力和生命力，變得自發和可持續。近年香港政治持續升溫，但焦點往往集中在政制發展上，很容易使人忘掉很多民生政策其實和政治密不可分。它們看似微不足道，但並不代表它們不重要，可以隨便被輕視、任意被遺忘。

在沒有進一步的民主化下，要鞏固已有的民主、防範獨裁的管治模式，就必須讓市民在各種政策範疇，如房屋、社區規劃、交通和食物安全等方面，看見政治的含意，從而為喚醒公民意識、推動制度改革提供機會。這樣可以使市民認識到，即使他們以為和政治不相干的政策，內裏也和政治骨肉相連，是捍衛民間自治、抗衡獨裁的重要陣地；即使他們願意退一步，希望當順民來換取生活上的安逸，但無孔不入的極權政府仍會追隨而至，威脅人們生活的各個環節。

把政治和善治 (good governance) 生活化，對防止獨裁有不少作用。首先，政治議題更「貼身」和生活化，既能減低市民對政治的抗拒，更能引起一些常常感到「政治與我何干」的市民的關注，使他們看到政治生活化和日常化的一面。其次，由於生活的多元化層面容易引起廣泛市民的共鳴和關注，有助團結民間，建立共識，抗拒獨裁。再者，民生政策是相對容易爭取改善

空間的「戰場」，對公民社會開展合作經驗及奪取一些「小勝利」(small wins)，從而加強與當權者角力的信心及士氣、減低現時政治低氣壓下的無力感，會有很大的作用。

《完美的獨裁》一書給人們的最大教訓，是說明孤掌難鳴，好人的沉默是完美獨裁的最大幫兇，獨裁政府的成功需要有順民配合。政治始於生活，也歸於生活，面對獨裁政府的步步進逼，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是戰場，每個主動順服的人也是共謀和幫兇。因此，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必須學會珍惜和爭取在生活上不受政府干預的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

在沒有進一步的民主化下，要鞏固已有的民主、防範獨裁的管治模式，就必須讓市民在各種政策範疇，看見政治的含意，從而為喚醒公民意識、推動制度改革提供機會。這是捍衛民間自治、抗衡獨裁的重要陣地。

註釋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②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 no. 4 (1982): 777-95.

④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⑤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1994).

⑥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

黃偉豪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